

从唐氏三兄弟的历史看近代 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

汪敬虞

20年前,我曾写过一本《唐廷枢研究》的小书。在我最初的计划中,这只是整个研究的一部分。原来唐廷枢有兄弟三人,上有一个哥哥名叫唐廷植;下有一个弟弟名叫唐廷庚。他们都是中国近代的黎明期出生的:其中唐廷枢出生于1832年,^①唐廷植出生于1827年,^②唐廷庚据说出生于1845年。^③他们三兄弟在国外被称为“中国工商业现代化的先驱”,“在上海中外贸易关系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依据外国的方式开创和发展商业的进步群体中,他们可以称得上是这一群体的

① 唐廷枢出生月日,有两种记载:据徐润的《徐愚斋自叙年谱》第57页的记载推算,应为2月29日;据沈毓桂《唐景星观察传》记载推算,则应为5月19日。参阅《万国公报》,第47册,第11~13页。1892年12月。

② North China Herald, 1897年9月3日,第459页。有的记载说唐廷植1888年71岁,则出生应为1817年(North China Herald, 1888年12月21日,第675页)此说不确。

③ Carl J. Smith(施其乐):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 载 The Chung Chi Journal, 《崇基学报》,卷10,第1~2期合刊,1971年10月,第81页。

领袖。”^① 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角度看，他们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第一代。他们出生在一个家庭之中，人生经历，自然有相同之一面。而在相同之中，又有不同的一面。对三兄弟的综合比较研究，就比对唐廷枢一人的研究，内容要丰富得多。它可以看出单独的个人传记研究中所不能看到的问题，而在个人传记中所看到的问题，在综合比较研究中，又会更加深入一步。我当初的计划，就是要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试探。然而，在我写完《唐廷枢研究》以后，原来计划后续的工作，被迫停了下来，一直没有机会实现。原因是资料的搜集不能到位，下笔为难，更重要的是：当时有一项更为迫切的工作提上了日程，需要全副精力应付，腾不出手。20年过去了，如今年已老耄，精力就衰，而且离开了工作岗位，搜集资料更加困难重重。原来的计划，看来已不可能实现。但20年来个人零零星星地也积累了一些资料，从而也形成了一点看法。现在初步整理成为一篇短文，作为我对前此研究的一个补充，同时也是稍稍弥补自己的研究工作遗留的缺陷。然而力不从心、粗疏讹误，所在多有，读者进而教之，不胜企望。

—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唐氏三兄弟为什么都成为“中国工商业现代化的先驱”？也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工商业现代化先驱”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分析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他们的家庭，从他们出生的地方说

^① Carl J. Smith(施其乐):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 载 *The Chung Chi Journal*, 《崇基学报》, 卷 10, 第 1-2 期合刊, 1971 年 10 月, 第 81 页。

起。

唐氏三兄弟一家所在是现今的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这块地方在明清时期是香山县属上恭常都,临近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和英占的香港。这里的人,总起来说,是最早和西方人士接触,也是最先认识西方世界的中国人。至今人们还常说:“上恭常都人勇于航海、不畏波涛,纷纷到海外谋生。”^①以美国而言,19世纪中叶,美国加州金矿的矿工中,就集中了许多来自上恭常都的华侨。其后这些华侨又多转而从事农业或商业,如夏威夷蔗糖业的开发,就来自包括香山在内的珠江三角洲的移民。而加州历史最久的永合公司,经营瓜菜业百余年,并附设合兴信局,开展汇兑等金融业务。^②在这一活动的早期,唐廷枢的哥哥唐廷植,就曾经涉足其中。19世纪50年代初,他和他的叔父在加州开了一家同和公司^③(Tun Wo & Co. 亦作 Ton Wo & Co.^④),进行上述金融活动。他的叔父提供了大量的资本,而唐廷植也自他从前在香港当翻译时的工资积蓄中,提供了适量的资金。后来的研究者说:“不管这种特殊的金融安排是怎样进行的,当他再回到中国时,他在加州的实业活动,必然为他后来国内的资本主义企业奠定了基础。”^⑤

对西方世界的最先接触,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传播西方文明的传教士进入中国。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入侵,传教士的活动成为西方入侵中国不可缺少的一环。和澳门、香港咫尺之遥的香山,那里的村民,既可以在珠江口上看到西方的鸦片趸船,又可以在

① 《珠海乡音》第12期,1988年12月15日。

② 同上。

③ The Chung Chi Journal,1971年10月,第91页。

④ New York Daily Tribune,1852年6月7日。

⑤ The Chung Chi Journal,1971年10月,第91页。

澳门和香港听到传教士兴办的学校传出的读书声。曾经先后接收唐家三兄弟入校的马礼逊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和继马礼逊学校之后接收他们的伦敦布道会学校(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School),它们的创办者或主持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理雅各(James Legge),一个把西方的《圣经》译成汉文,共21卷;一个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共28卷。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在接近中国人这一方面所下的功夫。还有一个在澳门开了一座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的长老会牧师哈巴安德(Rev. Dr. Andrew Patton Happer),在马礼逊学校由澳门迁至香港之后,甚至想把他的学校迁至唐廷枢的老家,因为那里的人对基督教的影响特别有好感,从而能使他更好地接近中国人。当这一设想未能实现时,他又向长老会建议对中国的学校进行补助,条件是“他们的课程表中把《圣经》也包括进去”。他的意图是:经过这样安排,这个村庄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传教的良好基地。^①

唐家三兄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入马礼逊学校的。

当然,中国学生后来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1840年11月被录取的13岁的容闳,后来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和中国第一批幼童出洋到美国学习的带领者。但是也有进校当年就被学校开除或被不放心的父亲领走的,进退对比,无比鲜明。

唐家三兄弟也有彼此相同和各自不同之处。他们共有一个据说当过马礼逊学校主持人勃朗(S. R. Brown)医生的苦力的父亲,^②又共有一个当过香港一位执行官何德弗斯(Charles G. Holdforth)的买办的叔父^③。当有的学生的父亲放心不下把儿子又从学

^① Archives of the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转见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2页。

^② H. N. Shore: The Flight of the Lapwig, 1881年版,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八),1961年版,第423页。

^③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93页。

校拉回家里时,唐廷枢三兄弟的父亲唐宝臣却把他的3个儿子押给勃朗,为期8年。为的是8年以内,可以免费上学^①。他亲口对勃朗说:

我们曾经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愿意免费供养和教育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外国人想拐骗他们离开他们的父母和国家,把他们一步一步地转送到国外去。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从他们入学之日起,我一直坚持把三个孩子交给你们学校。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最大的孩子已经有资格以一个译员的身份从事公务活动。另外两个孩子学习也不坏。对你们教给他们的教义,以前我非常担心。现在看来,他们变得更好了。虽然我的国家的习俗禁止我信教,但我自己相信它的真理。我不再有任何担心害怕了。你们的操劳,是为了别人好,不是为了自己。现在我完全理解了。^②

父亲的信念如此,但儿子们的表现和心态则并不完全相同。这反映在很多方面,主要在两件事情上:一是英语的学习,一是基督教的信仰。二者都为日后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所必需;一个是谋生的手段,一个是谋生的条件。三兄弟中,在英语学习上成绩最好的是老二唐廷枢;在基督教信仰上表现最突出的,是大哥唐廷植。而三弟唐廷庚,则二者均居下游。

唐廷枢擅长英语,是有口皆碑的。在他离开学校担任香港巡理厅翻译期间乃至后来当洋行买办的时候,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得到普遍的赞扬。有人称赞他“英文写得非常漂亮”,^③有人

① Archives of Jardine, Matheson & Co. (抄件),唐廷枢曾孙唐佑钧先生提供。

② Chinese Repository,卷14,1845年10月。转引自The Chung Chi Journal,1971年10月,第82页。

③ 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载《清华学报》,1961年6月,第165页。

夸他“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①而巡理厅的上司则把他看成是“华人和欧籍翻译中能力最强的一位”。^②甚至在中国人当中,唐廷枢的英语水平也颇为人称道,争说他对“英人之语言文字,一一尽得其奥窅”。^③唐廷植的“英语教育和对西方行为方式的熟悉”,也是远近闻名,中外共晓的。他在19世纪50年代初、为美国加州金矿华工奔走,就充分发挥了他的英语优势。他不但把所有“花旗国”对“金山汉人采金条规”译成中文,“核实无讹”,公诸华工,^④而且用英文投书美国新闻媒体,反映华人意见,^⑤并且代表华人会见美国加州当局,和州长进行“面对面”的谈判。^⑥三兄弟中,只有老三唐廷庚显得落后一大截。一直到他离开学校将近15年的1872年,他还被他的校长理雅各说成是“对英文的掌握,不如他的两位兄长”^⑦。

灌输《圣经》和对基督教的信仰,这是西方传教士办学的主要目标。上面提到,他们把三兄弟的家乡看作是“对基督教的影响特别有好感的一个地方”,曾经设想把唐家的村庄作为学校的首选地址。为了把这个村庄变成传教的良好基地,他们不惜工本,愿意对中国人自办的学校进行补助,条件是“他们的课程表中把《圣经》也包括进去”。

然而,在当时这与中国学生和大多数家长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上面刚刚提到唐氏三兄弟的父亲对勃朗的一段表白,就

① 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载《清华学报》,1961年6月,第169页。

②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7页。

③ 铸铁盒:《福建候補道唐公像赞并序》,转引自《万国公报》第49册,第12-14页,1893年2月。

④ 《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 1853年第1号。

⑤ New-york Daily Tribune, 1852年6月7日。

⑥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90页。

⑦ Legge Collection, Archiv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转引自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5页。

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父亲的也好,儿子的也好),基督教和《圣经》都不过是取得饭碗的资格。饭碗有了,《圣经》也就抛在一边了。在唐氏三兄弟中,大哥廷植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是比较突出的。他是三兄弟中惟一的接受了洗礼的。在1842年给学校的一封信中,他亲笔写道:“勃朗先生是我一生中认识的最好教师。他的学校也同样如此。在我们中国这一块,我想没有像他所办的这种学校。”然而即使如此,“他的这一兴趣,也没有维持多久,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再也没有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积极的布道者。”^①

有突出表现的哥哥如此,两个弟弟对教会则比哥哥又保持了一个更大的距离。唐廷枢“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但是他没有信奉基督教的表示,虽然他还是到教堂参加礼拜”。^②至于唐廷庚,从他在1872年4月写给他的老师理雅各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更加直率尖锐。他写道:我得益于教堂,同时也得益于我的教师的地方非常之多。这是真的。我知道,忘记你教给我的福音,那是很不应该的。但是,我越是细想这个问题,就越是感到羞耻和痛苦,我必须请求您的原谅。”^③应当记住,唐廷庚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他走向他二哥主持轮船招商局的时刻,也就是他捧上了一个较大的饭碗的时刻。

所有这些差异,都为三兄弟日后各奔前程,提供了各自的条件。可以这样说:他们前半生的学习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后半生的工作和事业上的人生道路。如果把镜头扩大一点,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这个角度去看,那么,唐氏三兄

①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3页。

②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5页。

③ Legge Collection, Archiv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转引自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5页。

弟各自的一段人生历程,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时代环境的缩影之一。

二

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角度看,唐氏三兄弟各自的事业经历,也有单独研究的价值,更有综合比较研究的价值。

毫无疑问,三兄弟在离开学校之初,都有一段长短不等的充当翻译的历史。英语水平最好的唐廷枢,离开学校以后,先在香港一家拍卖行里当了几个月的“职位很低的助手”。^① 随后,在香港殖民政府巡理厅接他哥哥的手,当上一名翻译。^② 以后因才能出众,地位飙升。1853年升任巡理厅正翻译。1856年代理香港大审院华人正翻译。^③ 1858年离开香港到上海,任上海海关副大书。^④ 1859年升任正大书兼总翻译。^⑤ 1861年离开海关,进入怡和洋行,结束了12年的翻译生涯。^⑥ 以后在怡和洋行又当了12年买办,于1873年进入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又4年(1877),筹办开平煤矿(但在1885年以前仍兼管招商局业务),经营15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1892年终于任上。

大哥和二弟在离开学校的最初阶段,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大哥还没有结业,就被调到香港巡理厅担任翻译。1851年,他涉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892年6月3日,第741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 1892年10月14日,第568页。参阅《徐愚斋自叙年谱》,第58页。

③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58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1861年开始代理怡和洋行“在长江一带生意”,1863年正式担任买办。参阅《清华学报》。1961年6月,第144页、第164页。《徐愚斋自叙年谱》,第58页。

嫌一桩绯闻去职,遗下的空缺,由弟弟唐廷枢充任,他自己则随他的叔父远走美国。在美国加州呆了五六年,于1856~1857年间回归中国^①。1861年出任上海海关首席翻译,这一年唐廷枢离开海关,因此很可能是大哥接替二弟的位置。1870年进入怡和洋行充当天津分行的买办。当唐廷枢离开怡和进入招商局之后,哥哥又顶替弟弟的位置接任上海怡和洋行的买办,一直到1897年离世之日。总计唐廷植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前后达27年之久。^②和唐廷枢一样,也是终于任上。

三兄弟中年龄最小的唐廷庚,一生的事迹也最少,至少是反映他的活动的材料最少(当然这是就我所看到的而言)。如今我们只知道:他离开学校的时间是1856年10月,在三兄弟中最后离校。他离校后也担任过一个时期的翻译。间接的材料证明他离开这个岗位的时间是在1856年12月至1857年7月之间。^③也就是说,最长不到一年。往下便寂然无闻,从社会传媒中消失。一直到唐廷枢进入轮船招商局以后,才先后见到他登上了轮船招商局及其附设的保险招商局各口员董的名单。^④他在招商局20多年,始终是一个分局的经理(先是广州、香港^⑤,后是福州^⑥)。他虽然也捐了一个候选道,并得了三品衔,但只能在分局和那些候补知县、试用县丞为伍,地位显然在招商局上层人物唐

①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91页。亦说为1861年,见 North China Herald, 1897年9月3日,第459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 1875年8月28日,第214页。1897年9月3日,第459页。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7~91页。

③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5页。

④ 《洋务运动》(六)第32页;《益报》1875年11月1日;《申报》,1875年11月5日。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0,船务。

⑥ North China Herald, 1896年8月7日,第220页。

廷枢、徐润、叶廷眷等大员之下^① 1896年,他默默无闻地死在香山故里,^② 不像他的两位哥哥那样终于任上,享有名流悼念、媒体宣扬的排场和风光。

从三兄弟各人事业的实绩看,唐廷枢显然居于首位。他在怡和洋行12年中,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势力等经常业务以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推销鸦片、运销大米、食盐甚至企图染指内地矿山的开采^③。一句话,就像他的老板所说:“他现在代替我们的位置站着。”^④ 他为怡和洋行赚了大钱,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他自己,则不但在经济上积累了不少的资本,而且在政治上也积累了不小的声誉。李鸿章就称赞他“熟悉中外语言、文字、船务、商务”,^⑤ 甚至认为“堪备各国使臣”。^⑥ 著名的上海实业界人士经元善也说:唐廷枢、徐润“声望素著”,而“唐之坚忍卓绝,尤非后来貌为办洋务者可比”。^⑦ 这些都是明证。至于经济上的实力大增,个人资本的迅速积累,则更有大量事实可资验证:

在资本的积累方面,应该看到:唐廷枢在进入怡和之前,就已经开始涉足独自经营的工商业活动。最早在1858年,甚至在此以前,当他还在香港当翻译的时候,就曾开设过两座当铺,前后搞了4年。据他自己说,小小的当铺,每年都能赚到25%~

① 《洋务运动》(六)第32~34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1896年8月7日,第220页。

③ 参阅拙编:《唐廷枢年谱》,见拙著《唐廷枢研究》,1983年版。

④ 《清华学报》,1961年6月,第153页。

⑤ 《洋务运动》,(六),第56页。

⑥ 《洋务运动》,(六),第76页。

⑦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1988年版,第48页。

45%的盈利。^①5年以后,在美国南北内战期间,受国际棉价影响,上海棉价陡长,商家投机活跃。这时唐廷枢已在上海海关担任翻译,他看准了这一机会,迅速在上海开设了一家修华号棉花行,大搞投机活动,希图牟取暴利。^②但结果却并不理想。这时,他还没有正式进入怡和洋行,单靠一己的力量,就显得力不从心,升沉无定。在这方面局面之大改观,是在1863年正式进入怡和洋行之后。从此唐廷枢的经济活动,与前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是自营商业活动的扩大。在进入怡和之初,他就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以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并先后开设当铺和投资于上海3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活动。^③他利用掌管怡和洋行金库的机会,经常挪用怡和的库款,调剂自己营业的资金需要。^④

为了自营业务和买办业务的需要,唐廷枢还在洋行内设立了自己的“办房”,也就是买办的事务所。这里不但集中了他自己的商业活动,同时也集中了洋行的业务活动,合二为一。1872年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China Coast Steam Navigation Co.)成立之前,洋行的船舶代理部就设在唐廷枢的事务所内。当时怡和洋行老板就公开地说:他的天津轮船代理业务“经营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唐廷枢的事务所”。^⑤正由于此,对于唐廷枢的一些不正当的行为,洋行老板往往睁开一只眼睛,闭上一只眼睛。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在买办的事务以外,还需要在整个和对

① 《清华学报》,1961年6月,第157页。

② 参阅《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1~12页。

③ 《唐廷枢年谱》,1866年、1871年;见《唐廷枢研究》第162、169页。

④ 《唐廷枢年谱》,1863年、1871年;见《唐廷枢研究》第160、170页。

⑤ 《清华学报》1961年6月,第168页。

外贸发生联系的行业中,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机构——同业公所。在建立这些机构的过程中,唐廷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上海3个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丝业、茶业两公所和经营鸦片的洋药局,在1868年以前都已先后建立。创立这些机构的人,不是和唐廷枢一样的洋行买办,就是和洋行来往密切的丝商、茶商和鸦片商人。而唐廷枢和他的同行徐润等人,则都是这3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机构的核心力量。

其次,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唐廷枢在担任买办的过程中,还开始了对外国在华企业的附股活动。这是唐廷枢资本积累的主体。他在进入怡和以后的第五年,就开始附股于洋行经营的谏当保险行(Canton Insurance Office),而在华海轮船公司中,他一人独买400股,几乎占有公司股本的四分之一。^①事实上,他的附股活动,并不限于怡和洋行的企业。在华海轮船公司成立以前,他已经先后附股于1867年成立的公正轮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和1865年成立的北清轮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 Co.)。在这两个公司中,他都担任了董事,^②是“一群广东籍股东的领袖和代言人”。^③在华海成立的前后,他又附股于美国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and Co.)的苏晏拿打号(Suwonada)轮船和两家小洋行——马立司(Morris Lewis Co.)和美记(Muller H. and Co.)的船队,其中马立司洋行经理的洞庭号(Tung-ting)轮船的船老板,恰是怡和对手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的史柏丁(D. R. Spedding)^④。

唐廷枢的附股外商企业,事实上不止于此。例如1882年当天

① 《唐廷枢年谱》1867年、1872年,见《唐廷枢研究》第163、175页。

② 《唐廷枢年谱》,1868年;见《唐廷枢研究》,第164页。

③ A.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1958年版,第111页。

④ 《唐廷枢年谱》,1872年;见《唐廷枢研究》,第172~174页。

津英租界筹设煤气公司之初,他就主动认购股票 300 股(每股 100 两)。并且命令他所在的开平矿务局承购。^① 这个工厂在 1890 年建成,这是见于当时的媒体记载的。那些中途多有变故者,就不详见于记录了。例如早期他曾与西人合作共创一家糖厂。这家糖厂在经营的过程中,多次转手,后来成为怡和洋行的著名企业——中华火车糖局(China Sugar Refining Co.)但早期的历史,扑朔迷离,很难看出唐廷枢在其中活动的情况。^② 而他在离开怡和以后,还不忘故旧,参加了怡和丝头厂的投资。^③ 详情更加不为外人所知晓。

在资本的积累方面,唐廷植与唐廷枢有同样的经历。上面提到:唐廷植在进入怡和洋行以前,当他远走美国加州之际,他也曾和他的叔父在那里开过一家同和公司,尽管人们都认为唐廷植在加州的商业活动为他后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奠定了基础,^④ 但是和他后来在上海的活动比较,那只是小巫见大巫。和唐廷枢一样,只有在他接任怡和买办以后,唐廷植才得以在为洋行推进在华航运和贸易的同时,真正开始扩大自己的经济活动领域,迅速积累自己的资本。

和唐廷枢一样,唐廷植的资本积累,主要也是来自附股外商在华的企业。从 1874 年起,他就步二弟的后尘,开始附股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⑤ 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他的活动范围,又进一步扩大。仅在 1881 ~ 1882 的两年里,他附股的外商企业,至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882 年 2 月 15 日,第 188 页。

② Daily Press. 1869 年 7 月 17 日,转见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 年 10 月,第 92 页。

③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1990 年版,第 132、134 页。

④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 年 10 月,第 91 页。

⑤ Liu Kwang-ching: 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1862 ~ 1874, 1962 年版,第 141 页。

少有烟台纺丝局^①、上海荣泰驳船行^②、上海电光公司^③ 和中国玻璃公司^④。他还是上海火烛保险公司的首董^⑤，估计也是由于附股的关系。此外，他在香港东边山(East point)炼糖厂的筹备阶段，也曾通过他的二弟进行投资。^⑥

在附股外商企业的同时，他也从经济上积极支持二弟先后主持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以及其他企业。人所共知，开平煤矿之所以能顺利筹集资本，主要是通过唐廷植的“巨大势力和努力奔走”。^⑦ 而轮船招商局在 1883 年唐廷枢出国考察时，经营的重任，就暂由唐廷植承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⑧ 1890 年唐廷枢接办香山银矿时，所有公文账箱尽交唐廷植保管。^⑨ 一直到 1897 年唐廷植死去为止，他的实业活动一直没有中断。就在死前不久，他还主张把自来水从租界引进上海县城，继承了他的买办衣钵的长子唐荣俊(杰臣)完成了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的创建。^⑩ 居住在华界的中国人很快地就“享受到他的主张带来的好处”。^⑪

和两位哥哥比较起来唐廷庚在这方面的活动，就大为逊色。从现存的材料看，他在轮船招商局似乎并不得意。19 世纪 80 年代初，招商局为了揽载客货，曾在上海南北两市分设长裕泰行及长

① 《申报》1883 年 7 月 25 日；1887 年 12 月 3 日。

② North China Herald, 1892 年 2 月 9 日, 第 115 页；1893 年 3 月 3 日, 第 308 页。

③ 《申报》1885 年 4 月 20 日；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4 年 4 月 22 日, 第 371 页；North China Herald, 1885 年 5 月 1 日, 第 506 页。

④ 《申报》1882 年 8 月 2 日；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4 年 4 月 28 日, 第 389 页。

⑤ 《申报》1882 年 10 月 20 日；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2 年 11 月 14 日, 第 466 页。

⑥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 年 10 月, 第 92 页。

⑦ North China Herald, 1897 年 9 月 3 日, 第 459 - 460 页。

⑧ North China Herald, 1897 年 9 月 3 日, 第 460 页。《申报》1883 年 4 月 19 日。

⑨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47 页。

⑩ 《中外日报》，1904 年 3 月 5 日；《大公报》，1904 年 4 月 26 日。

⑪ North China Herald, 1897 年 9 月 3 日, 第 460 页。

发栈,由唐廷庚具体经管。这个原本与怡和、太古两外籍轮船公司争衡的地方,据说却被主其事者转为营私舞弊的场所。当时有人揭发长裕泰装船行经常“退客货,先装己货,至欠水脚一万余金”。^①长发栈则“双扣九五佣钱,专写客票,欠一万余金”。^②以致开销无着,于1884年9月“招顶闭歇”^③。

唐廷庚为轮船招商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他在1882年为招商局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分局。然而到手不过两年,转眼又在1884年把这一笔财产拱手让给了旗昌洋行的老板福士(William H. Forbes)。^④应该记住的是:这正是中法战争期间招商局所谓“售产换旗”的时刻。此后唐廷庚寂然无闻地由广州分局调往福州分局,而转到福州分局以后,就变得更加消声敛迹了。

应该看到,现存的材料也反映唐廷庚有一些实业的活动。他和徐润的侄儿徐秉诗于1883年在安徽池州开了一座煤矿,但却与徐润的同行、宝顺洋行的买办杨德发生了纠纷,结果也不理想^⑤。

总之,唐氏三兄弟中惟一的一个没有走洋行买办之路的小兄弟,光景却是最不如意的。

三兄弟在事业、人生道路上的依傍,可以说是各不相同的。大哥和三弟二人,一个是洋行,也就是外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这是第一条道路;一个是官督商办的企业,也就是洋务派的政治势力,这是第二条道路。二者实际上都是出自唐廷枢对他们的安排。而他对自己的安排,则显然是脚踏两只船,兼二者而有之。他先是走上第一条道路,后又改换为第二条道路。沿着第一条道路一直走

① 《洋务运动》(六),第126页。

② 同上。

③ 《字林沪报》,1885年12月4日。

④ Hongkong Land Registry, Memorials, 11687、13264,转引自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92页。

⑤ 轮船招商局档案;《申报》,1883年1月9日。

下去的唐廷植,看来他的境遇是比较顺适的。走第二条道路的唐廷庚,则不那么顺畅。而为他们作出安排的唐廷枢自己,政治上看来是十分充实的。在他死后六年,根据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奏请,清廷已准许在唐山为其修建专祠,并自唐山开平煤矿节余中提取白银2万两,以资兴建。此外,总督本人也捐献巨款用于专祠的维修,为直隶和其他各地的下属作出榜样。^①这种殊荣,是他的大哥和三弟都不能望其项背的。但是,如果单纯从经济上观察,如果单从个人的资本积累和财富享受上看,局面又完全颠倒了过来。这里可以拿他的大哥和他作一比较。上面提到,唐廷植对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的集资和经营,都曾作过贡献。但是,如果和唐廷枢比一下,那么,直接先后主持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唐廷枢,其贡献远在唐廷植之上。他为这两个企业输送了上百万两的资金,正如他自己在谈到招商局招股情况时所说:“枢等原是生意中人,因承爵相(李鸿章)委任,又荷诸君不弃,故尽将自己所有及邀集亲友极力附股,方将此局成立。”^②可以看出在倾其所有以赴事功方面,唐廷枢至少是不亚于唐廷植的。然而,在他们身后,各自的经济状况又如何呢?这里有一个极为鲜明的对照:唐廷植在辞世之日,上海的一家西文报纸,有极为详细的报道,那种场面的富丽堂皇,用不着细说,单是死者的棺木就可以想见他生前的富足与豪华。报纸是这样记载的:“这付棺材非常重。用的是极贵重的木料。它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采饰和油漆,一直到油漆的外壳有一寸多厚,这样就可以长期抗湿防潮。”^③与之对照的是:唐廷枢死后,广帮商人曾发起抚恤唐的遗孤说:“该故道创办开平,备著辛勋。今其身后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898年6月13日,第1008页。

② 《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184页,转引自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见《历史学》,第1期,1979年3月版,第110页。

③ North China Herald, 1897年9月3日,第459页。

萧条，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报，似非酬功劝后之义。”^①

这是唐廷植与唐廷枢两兄弟的具体人生历程。其实，这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升沉历程的一幅缩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一幅缩影。唐家兄弟如此，整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总的说来，亦复如此。

三

关于唐廷植一生和唐廷枢前半生所走的道路，在已往的学术论坛上，曾经普遍地被认为是一条应该加以批判的道路。不但这一条道路不能肯定，走过这一条道路的所有人物，也都不能肯定。

我在初写《唐廷枢研究》这本小书中，对这个具体人物没有作完全的肯定，但也没有作完全的否定。我在等待更多的实证。后来我在继续接触有关唐廷植史料的过程中，从唐廷植的际遇和他的所作所为中，我得到的信息，更加坚定了我在《唐廷枢研究》中的观点，在本文的最后，我想把我所接触到的材料，梳理编排一下，以就教于对此有研究兴趣的同道。

这也可以而且应该从唐廷植的少年时期谈起。

在1845年马礼逊学校的年度报告中，保存了高年级学生唐廷植的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为《中国的政府》。论文“指出了中国政府的偏私和腐败”，“激烈地批评了这一不正当的行为”，“表明了作者非常熟悉中国政府的机构和运作。”^② 这是出自一个18岁少年的手笔。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应该承认，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直到他离开祖国去美洲新大陆之时，他给人的印

^① 《盛宣怀档案·为恩恤唐廷枢遗孤禀》，转引自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见《历史学》，第1期，1979年3月版，第110页。

^②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5页。

象,仍然是一个“被这个帝国所遗忘的臣民”。^①

在中国政府和外国教会之间,唐廷植的最初选择,的确是外国教会。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在写作上述论文的前3年,他在一封信中就称道勃朗先生是他一生中结识的最好教师,勃朗的学校也是他一生进的最好的学校。他在离开香港去美国之先的1851年6月,就在香港接受了维多利亚主教的洗礼。在到达美国之时,随身带了不少引见旧金山教会人士的介绍信。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虔诚的宗教的皈依者,“承诺对宗教信仰的真诚”。^②看来他选择这一条道路是铁定的了。

然而,人们又看到他有另外的一面。

的确,唐廷植在马礼逊学校给校方写过那样热情的信,但是写这种信的,并不止唐廷植一人,而且根据当时的内情透露,这些信都是在“教师监督和建议之下写的”,它从一个角度上反映了校方传教的重压对学生的冲击。正如勃朗牧师所耽心的:“可怜的孩子!他们有那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然后才能成为基督教的信徒”。^③事实上,唐廷植就是这些“可怜的孩子”中间的一个。他虽然接受了维多利亚主教的洗礼,并且也的确为美国教会做了不少的事。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他的这一兴趣,并没有维持多久。1851年进入美国以后,他的宗教热忱就开始萎缩。尽管加州教会中的人,对他怀有极大的期待,希望通过他“把基督教的福音带给他那个值得怀念的国家”,“完成真主对这个被拯救的灵魂的打造”。^④但是,此时唐廷植的兴趣,已经移向他的移居美国的同胞,移向华人的事业。他和他的叔父生活在一起,留在华人聚居

①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9页。

②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8页。

③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3页。

④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8页。

的城市从事商业的活动。他在自己成立的公司里面穿着中式纺绸长袍,扎腿裤子,绣花鞋,俨然公司的首领。事实上他到美国不久,“就感到自己在华人社会中已经取得了领袖的地位。”^①这使得他的灵魂拯救者美国教会中人大大失望而纷纷揣测:“他可能过于投身于其商业和外交活动。为了取得华人社会的充分信任,他可能认为最好不要与基督教界人士过于亲密和公开来往。”^②那些声称要拯救唐廷植灵魂的人算是说对了,唐廷植有一颗中国心。

唐廷植的这颗中国心,在他到美国以后,为华工争取平等待遇、抵制美国排斥华工的交涉中,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加利福尼亚的采金热潮正在兴起。大批中国人也远渡重洋来到这里,希图取得谋生的出路。唐廷植一到旧金山,就受到当地华人的热情欢迎,因为这里许多中国人曾经在香港殖民地政府户籍司登记过,大家都记得他那一段“处处维护中国人利益”的历史。他的办事能力和“在任何时候都有为他们的权利而奋斗的勇气”,使得他的同胞对他“具有充分的信赖”。从而他以一个年仅20岁出头的青年,被当地华人一致推为旧金山华商公所——阳和会馆的总董。唐廷植没有辜负同胞的委托,在以后不久发生的美国排华事件中,由于他与当地官员的极力交涉,使得美国政府直接驱赶华侨或加课人头税以限制华人入境的企图都未能立即实现。^③当年他写给加州州长毕格勒(Bigler)的一封信,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这封信是1852年4月29日发出的。信中提出了两个问题,说明反对排华,中国有理;取消排华,美国有利。关于前者,他反对美国当局把进入美国的中国劳工都看成是听命于美国老板的不自

①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9页。

②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89页。

③ North China Herald, 1897年9月3日,第459页。

由的契约劳工。他向这位州长申辩说：“你把中国人说成是‘苦力’，这个称呼，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很多中国人，但是，这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苦力’。‘苦力’这个词，不是中国原有的，它是从外国传入的，就像它传入美国一样。”“根据我们的理解，苦力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如此而已。我们从来不知道它是特指一个阶级，像你们所特指的那样，是一种被强迫服从的契约劳动者。”“如果你们所说的‘苦力’，指的是劳动者，那么，我国内地很多人都是苦力。”“如果‘苦力’指的是你们所说的契约奴隶，那么，他们都不是‘苦力’。”针对美国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律禁止中国苦力进入美国矿场，他在信中对这位州长说道：“通过一项立法把我们当苦力看待，不管我们是不是苦力，我们不相信这是你的意图。你说并没有任何条约规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中国的移民，中国政府也没有权力抱怨你们用课税或其他办法的立法，把我们从美国赶出去。对我们的政府说来，这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对目前中国人民抱着对美国非常友好的情谊而言，它起了离间的作用。”

关于后者，在抵制美国不公正对待华工的同时，信中极力强调中国移民对美国所起的重要作用。它指出：在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苦力”，不但不是契约劳工，而且有许多是商人、工程师和教师，他们不但不是“被强迫服从的劳工”，而且是“受人尊敬的阶级”。“他们不但租用你们的船只，而且购买其中许多船只，并且还要购买更多的船只。当他们租用船只时，值得你们注意的是：对你们国人，我们是优先的。我们总是优先雇用你们的船只，即使我们从他人那里能够更便宜地租用，还是对你们优先。当一只商船到达之时，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你们的货船、轮船以及货车等等是怎样积极地 and 有利地被我们加以雇用。”“显然，我们从你们的国家得到的利益愈多，你们从我们的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就会愈大。我们从你们允许开采的金矿中采出来的黄金，是美国对华贸易增长得那么快的一个因素。”“如果你们一定要限制亚洲的移民，那就等于你们限

制亚洲的贸易。而这种贸易,根据我们从你们的政府那里了解到的,是美国最希望增加的。”^①

唐廷植有理有利的劝告,可能打动了美国当局。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的一场官司,据说闹到东海岸的首都华盛顿,连美国国务院也不得不邀请唐廷植前往首都谈判,以求得事态的平息。正由于此,唐廷植在美国华人中间“留下了极高的声誉”。他的画像甚至在以后多少年中,还悬挂在纽约博物馆的墙上,被题为“一个著名的中国商人”而受到人们的怀念。^② 他的行为,至今被人们认为是“对外御侮,不遗余力。”^③

应该看到,唐廷植离美返国之初,并没有立即选择洋行买办的职位,而是以首席翻译的名义,进入成立不久的上海海关税务司。实际上,他的职务,不但是通事兼译公文,而且总理进出口税单,检查进出口货物。^④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甚至有意把他提升为一口的税务司。^⑤ 在唐廷植的心目中,这正是以他“自己的能力为他的国家服务”的良机。^⑥ 然而当时的中国官场对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人,还是怀着猜疑的心理。这使得唐廷植立即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官的身份和品级,就很难在他的国家的公共事务中取得进身之阶。因此,他捐了一个五品同知的官衔,企图以此发挥自己的理想,让他的国家“接受西方的观念”。^⑦ 这里的“西方的观念”,当然包括了他的资本主义的理想。

① 以上俱见 New York Daily Tribune,1852年6月7日。

② North China Herald,1897年9月3日,第459页。

③ 《珠海乡音》,第12期,1988年12月25日,第28页。

④ 丁日昌:《请办海关唐国华勒索详》,见《巡沪公牍》,卷三;李鸿章:《唐国华赎罪片》,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引自《上海研究论丛》,第1辑,第219页。

⑤ S.F.Wright: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1950年版,第841页。

⑥ North China Herald,1897年9月3日,第459页。

⑦ North China Herald,1897年9月3日,第459页。

然而,他的算盘完全落空。五品官衔和外国税务司控制下的海关的背景,不但不能使唐廷植施加自己的影响于清朝统治下的官场,反而弄得他声名狼藉,差一点坐进上海道台为他设置的班房。

原来在唐廷植进入海关不久,洋务运动中军用工业的建置,就进入了发动的阶段。中国第一家大型军火兼造船工厂——上海江南制造局,筹办于唐廷植进入海关的第二年。这个厂的筹建,和唐廷植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牵连。它从经办此事的上海道台丁日昌给李鸿章的禀帖中透露出来一点端绪。禀帖中说:“上海虹口地方,有洋人机器铁厂一座,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实为洋浜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前曾问价,该洋商索值在十万洋以外,是以未经议妥。兹有海关通事唐国华,历游外国多年,熟悉洋匠。本年因案革究,赎罪情急,与同案已革之扞手张灿、秦吉等共集资四万两,购成此座铁厂,以赎前愆。厂内一切机器俱精,所有匠目,照旧发价,任凭迁移调度”。^① 这个禀帖中的唐国华,就是唐廷植在官场的名字。唐廷植犯的案,据说是在检查进出口货物时索取费用。事发之后,丁日昌立即将唐廷植的同知衔革掉,并交发上海县堂扣押审办。^② 结果是:唐廷植不但赔了钱,而且丢了官。不但革了同知的职衔,而且“与张灿、秦吉一体革役”。^③

这对唐廷植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4万两赎罪费不算,他还失去了晋升海关税务司的机会。当时,总税务司赫德已经内定了两名中国人担任税务司,但是上海关道“把其中一人投入监狱,从而破坏了他的机会”,^④ 这个人就是唐廷植。众所周知,在赫德

① 转见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载《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

② 丁日昌:《巡沪公牍》,卷三,《请办海关唐国华勒索详》。

③ 李鸿章:《唐国华赎罪片》,见《上海研究论丛》第1辑,1988年,第220页。

④ S.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1950年版,第840~841页。

把持之下,中国海关各口的税务司,一律由外国人担任,中国人从无染指的机会。唐廷植虽然最后没有失去自由,但却失去了迁升的机会——一个眼看到手的“殊荣”。

也许是唐廷植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吧,他不久就离开了海关,进入了唐廷枢先期已在的怡和洋行,经理它的轮船公司在天津的业务。^①从此一直到他死去,始终没有脱离这家洋行。综计他担任怡和买办,前后达27年之久。

唐廷植的这段经历,至少给我们两点提示:第一,洋行职业不是唐廷植最优的选择。洋行和海关都是他的长项——英语翻译——可以充分发挥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用武之地。但是他回国之初,优先选择的,不是洋行,而是海关。当时的海关虽然也在外国势力控制之下,但名义上究竟还是中国的机构。唐廷植是不是就因此而决定去海关,当然还不能遽下判断,还大有研究的余地。但他是在海关呆不下去,迫不得已才去怡和洋行的,这是不移的事实。他最初是想通过中国的海关来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也是不移的事实。而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最终实质上是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当然,他到怡和以后,很自然地首先是附股怡和及其他外国洋行在华企业。但在依附外国洋行以提高自己经济地位的同时,他并没有忘怀于自己原来所希冀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仍然在资金的筹措方面积极支持唐廷枢主持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不但如此,他还通过附股把外国洋行的企业转变成华人企业。烟台纺丝局之由德商宝兴洋行转为中国人所有,就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个例。^②当然,这条道路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终唐廷植的一生,他始终仍是处在外商企业附庸者的地位,并没有真正创办名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875年8月28日,第214页;1897年9月3日,第459页。

^② Commercic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77年,烟台,第39页。
China Maritime Customs; Trade Reports 1881年,烟台,第9页。

副其实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变化也是客观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

第二,洋务派官僚,是唐廷植最佳的靠山。尽管唐廷植进了中国海关,捐了同知官衔,想借助官僚、特别是洋务派官僚的势力,发展自己的事业,但是,事实证明,这个希望是注定要落空的。他之离开中国海关,实际上是中了洋务派官僚丁日昌设下的圈套。这从上面提到了日昌的那封禀帖中可以看得明明白白。丁日昌是想借此敲唐廷植一下竹杠,以达到收买这家外厂的目的。禀帖中所说的唐廷植“因案革究”,据说是在检查进出口货物时索取费用。然而,这个“索取费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李鸿章的《唐国华贱罪片》中是这样说的:“因华商每遇洋船装货,所议合同及水脚总单并洋行保险凭据,均系洋字,华商往往不能辨识,嘱托唐国华翻译,偶然送给银两酬劳。续因翻译较多,并因到关纳税,应给税单妥速,遂各相沿送银酬谢。”^①这样说来,唐廷植所得的,并非无偿的“索取费用”,而是有偿的劳务报酬。连李鸿章也不得不承认“核其情节,尚与讹诈需索者有间”。^②因此,尽管事发之后,丁日昌立即将唐廷植扣押审办,但一当唐廷植等答应报效买下这家铁厂,罪名也随之烟消云散。丁日昌说唐廷植“贱罪情急”,^③实际上是他需款购厂情急。观乎李鸿章对他的两次批示,一则曰:“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批飭速行定议。”^④再则曰:“该项铁厂机器,交涉外洋,未便迟延,致滋纠葛。”^⑤可以看出,丁日昌之购厂情急,是有其理由的。

其次,唐廷植和这家外国铁厂看来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原来

① 《上海研究资料》,第1辑,第219页。

② 《上海研究资料》,第1辑,第220页。

③ 丁日昌禀帖,转见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④ 同上。

⑤ 李鸿章:《唐国华贱罪片》。

外厂索价在 10 万洋以外,通过唐之手,4 万两便可成交。如果彼此没有一点特殊的关系,就让人不可理解。根据当时的记载,这家外国工厂就是 19 世纪 60 年代在上海设立的美商旗记船厂(Thos. Hunt & Co.)。^①这就更增加了留美多年的唐廷植和铁厂关系深厚的可能性。人们完全有理由作这样的推断:丁日昌在这里是利用了唐廷植和外国势力的关系。唐廷植之于江南制造局,实际上是帮了丁日昌的大忙,而丁日昌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堵塞了唐廷植接近新式工业的道路。在洋务派官僚中,丁日昌是比较开明的一员。丁日昌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就更不足论了。

我对唐廷枢研究的补充,大体上到此为止。当然,这个补充仍然是初步的,它仍然遗留许多应该研究的方面。因为唐廷枢和他的兄弟的活动,都不限于经济这一个方面。从中国的现代化这个角度看,他们的活动中,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层次。拿唐廷枢来说,他在 30 岁(1862)的时候,曾出版一部他撰写的《英语集全》,上距被称为中国人编写的最早的英汉词典——《红毛蕃语》,不过 30 年的光阴。35 岁(1867)的时候,与著名的沙船商人吴炽昌等人在上海设立过一家普育堂,^②36 岁(1868)以前,先后与上海著名洋行买办徐润等人创设上海茶叶公所、丝业公所和洋药局,并充任董事。38 岁(1870)以前与徐润等人在上海参与创设仁济医院、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元济堂,并任董事。40 岁(1872)时与徐润等倡议成立广肇公所,42 岁(1874)时参加上海英国领事麦华陀(W. H. Medhurst)、江南制造局翻译傅兰雅(J. Fryer)等人发起的格致书院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893 年 6 月 9 日,第 821 页。亦作祺记,参阅台湾中央研究院编:《矿务档》,二,第 861 页。

^② 汤志钧主编、吴乾兑、徐元基副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1989 年版,第 243 页。按《唐廷枢年谱》中据《教会新报》1870 年 3 月 19 日记载,定为当年发生之事。兹从《近代上海大事记》,定为 1867 年。

筹建工作,并任董事。^①同年协助容闳创办《汇报》,又对上海英华书馆进行赞助。^②43岁(1875)时受上海道台冯焌光札委为上海洋务局会办,会同总办办理“中外交涉一切事务”。44岁(1876)时,协助福建巡抚丁日昌办理洋务;参与中英烟台会谈,充任翻译;又为李鸿章筹办海军水雷试验。50岁(1882)时捐资修建苏州两广会馆。^③51岁(1883)时任山东赈捐公所江、浙、闽、粤经募首董^④。52岁(1884)时任上海陈家木桥赈所首董。^⑤而在52岁以前,据说他甚至被李鸿章看中要保奏他“备各国使臣”之用。^⑥当然,这只是传言,并没有成为事实。

唐廷植在这方面的活动,也不亚于他的二弟。他一边当着怡和洋行的买办,一边和弟弟一起参加上海丝茶公所的活动,乃至比他弟弟进一步参与汉口茶叶公所的筹建,并且担任公所的总董。当他61岁生日之前不久,他在一次推动上海动物园的成立大会上,以其亲临大会的讲演,表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⑦而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又和唐廷枢以及上海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公开致函租界工部局反对禁止华人进入租界公园的侮辱性举措。^⑧当然,他也有一些不光彩的活动。例如,他曾为贩卖鸦片进入了上海的会审公堂,留下了他一生中不光彩的一页。^⑨

① 格致书院英文名为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e, 直译应为上海工艺学院。

② 英华书馆(Anglo-Chinese School)为一所主要是“适应商界子弟需要”的教会学校。参阅 North China Herald, 1865年9月16日,第147页。

③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1959年版,第347页,第206号碑文。

④ 《申报》1883年10月5日。

⑤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1988年版,第58页。

⑥ 以上资料来源,除已注明者外,其余均见《唐廷枢年谱》。

⑦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月,第92页。

⑧ 《申报》,1885年12月8日。

⑨ The Chung Chi Journal. 1971年10,第92页。

至于三弟唐廷庚,和他的全部经历一样,在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值得写上一笔的记录。这可能是唐廷庚本人的活动,本来就少,而更多的可能,是我的发掘不够,只好暂时从缺,留待后人补充。

当然,这一方面活动的记录,在我的研究中,究竟是次要的。我对他们的研究,也不是单纯地局限于人物的本身。我的着眼点是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近代中国社会。我不是止于微观的研究,而是企图通过微观的研究达到宏观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且希望达到微观研究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期望。这篇短稿离我的主观期望,无疑还有很长的距离。我在结束这篇短稿之时,寄热切希望于后之来者。

(汪敬虞,191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著名文史学家唐振常先生逝世

著名文史学家、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唐振常先生于2002年1月2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唐先生为上海中山学社首任副社长、《近代中国》丛刊编委会副主任,对中山学社和丛刊工作备加关注与支持。在此,编辑部同人谨表沉痛哀悼。

本刊编辑部